



上 编



## 第一章 秋白的写作实践与分期

本章旨在考察瞿秋白写作风格、文体特点的阶段性和差异。尽管这必然地与秋白的生活经历、政治命运和文化志趣等因素紧密相关，然而我们仅从文体分析的角度，对秋白的写作实践作如下分期考察：

### 一、成名期：旅俄前后（1919～1923年）

秋白出生官宦世家，虽家道中落，但幼时所受的旧式家庭的教育却十分严格。他随父亲学山水书画，跟伯父习金石篆刻，其幼年的早慧为母亲及时发现并予以精心指点。在这良好的家教氛围里，秋白终于养成了永远不能被抹去的文人气质。

秋白幼时的文与诗绝大多数已无从寻觅，相传有《白菊花》<sup>①</sup>诗一首，作于14岁时，是现存秋白最早的诗作。其诗云：“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澹，无处觅霜痕。”此诗嵌入了作者小名“霜”和“秋”“白”三个字，被好星相之学的瞿父认为“把秋白的秋字、瞿霜的霜字都写了进去，而且是淡而无处寻觅，充满着不吉利语，恐怕是儿不得善终了”。<sup>②</sup>而瞿母则称之为好诗，认为秋白写出了白菊高洁的品性。今天看来，星相之说当然不能被我们所纳，但诗中透出的非凡气质，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秋白36岁临刑前，在长汀狱中写下的《卜算子》词。该词下阕云：“花落知春残 / 一任风和雨 / 信是明年春再来 / 应有香如故。”从容地面对死亡，憧憬美好的未来，这种视死如归、镇定高雅的气节，正是“文人”气质的一种表现。秋白少年时代开始养成的这种气质，不仅决定了他的选择，也影响了他所有的文章作品。

秋白的出身、家教、志趣和气质决定了他终生为文的必然。其文才在少时诗作中已露端倪，而不羁的性格、叛逆的意识又恰到好处地透过这些文字折射出来。中学时他就曾因为在作文中就题发挥，表示对社会的不满而受过处分；<sup>③</sup>17岁时母亲因家境贫困而服毒自杀，他又以七绝诗《哭母》抒发对不平世道的强烈谴责。失学、当乡村教师、借贷典当、家破人散、投亲靠友的生活逆境，促使这位年轻的学子更加发奋精进。有幸入俄文专修馆后，“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其作文“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sup>④</sup>

①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② 据羊牧之回忆录，见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注释。

③ 参见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④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见《忆秋白》第105页。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 1919 年 7 月 17 日北京《晨报》的时论《不签字后之办法》第一篇译作是 1919 年 9 月 15 日北京《新中国》杂志刊出的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第一首新诗是 1920 年 8 月 5 日出版的《人道》月刊创刊号上的《远》。此外，秋白最早参与创办的刊物是 1919 年 11 月 1 日以北京社会实进社名义主办的《新社会》旬刊。在该刊上，秋白共发表了 18 篇文章和 1 篇译作，有力地抨击了时政，宣传了新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写作不仅仅是青年秋白言志抒怀的手段和享誉扬名的载体，更是他渴求知识、塑造自我的一个途径。

机会终于降临在 21 岁的秋白身上。凭着三年的俄语修习和练就的“五四文笔”，秋白应聘成为《晨报》驻俄特派员，1920 年 10 月他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从此秋白完成了写作的“习作”期，一个崭新的“东方稚儿”以率真优美的文笔出现在世界读者面前。在旅俄近三年的时间里，秋白写了大量的通讯、散文及少量译述和理论文章，字数达 47 万余，今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第二卷中。

旅俄通讯当时主要发表于北京《晨报》，少量的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而撰写通讯正是秋白此间的本职工作。作为特派记者，他忠于职守，沿途和在俄期间，时时处处以记者的目光搜寻着一切有新闻价值的题材，时政是他的基本关注点。这些通讯的写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沿途见闻。写哈尔滨到莫斯科一路访谈的所闻所见以 20 篇约 6 万字的篇幅，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由远而近、由闻见到，逐渐向读者揭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神秘面纱；二是莫斯科见闻。该阶段有通讯 24 篇，计 13 万余字。秋白以记者的身份，以直接参与、访问等多种方式，真切地向国人报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党派、外交、经济、农民政策和国际共运等方面的情况；三是归途见闻。1923 年 1 月 25 日写于北京的《赤

俄之归途》是秋白“三年旅俄最后一次‘新闻记者式’的报告”。<sup>①</sup>这篇通讯与前面40余篇“通信”截然不同，淡化了政治性题材，以记者的行动、对话及场景描述，真实记录了告别苏俄回国的过程，给历时近三年的系列旅俄通讯画上了句号。

散文是秋白第一次旅俄时才开始大量写作的文体，辑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在哈尔滨时已着手写作。据秋白1921年11月23日在该书跋后的“附言”称：“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行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在《赤都心史·序》中，秋白亦称该书“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在序后的引言中，秋白还特别强调“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由此可知，《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秋白自觉的文学创作成果。综合两书的序、引言、跋等便可以清晰地辨知，秋白将旅俄素材一分为三：所有政治时事类题材均用通讯报道文体写出；一切个人所思所感，诸如“参加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则由散文抒写；而对“俄国革命之历史的观察、制度的解释”则我另有社会科学论文”；“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写出。

理论文章即秋白所称的“社会科学论文”，该时期存留不多。当时已付印的《俄罗斯革命论》也因战事终未出版。今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的仅有数篇介绍共产国际纲领、策略及国际共运史的文章。但文学理论文章保留尚完整，这时期所写的《俄国文学史》数篇关于托尔斯泰及俄国短篇小说的论文，序言已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中。这类带有编撰、译介性质的

<sup>①</sup>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文字 从作家、作品、流派、评论等文学理论的角度 粗略地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基本情况，给国内文坛输入了理论的清新空气。

访俄前后的文章是秋白写作成名期的作品，经过对以上写作史实的梳理，我们可以作如下小结：

第一 秋白的名字是随着‘旅俄通信’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而为读者知悉，以上作品是秋白的成名之作。

第二，这时期秋白的文章已涉及新闻写作、散文创作和理论写作三大领域，对文章体裁有了一定的理论见解，并进行自觉的写作。这在五四新文体发展初期具有拓荒的意义，秋白无愧为中国现代写作学、现代文章学的奠基人之一。

第三，秋白早年的文章中率真、坦言的特点已十分突出，在通讯和散文里均能直言报道或抒写而无所顾忌。这种中国史家不隐恶、不虚美的文人风骨以文化遗传的方式积淀、渗透着，在秋白的文章中逐渐形成稳定的写作个性。正因为此，在特殊的写作背景下才会出现《多余的话》这样袒露心扉、严以自律而近乎自虐的千古奇文。

第四，处于成名期的秋白所写的文章毕竟是“东方稚儿”的初试锋芒，其轰动成名无可否认有一定的题材优势——国内读者对全方位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渴望。其写作心态、思维方式、写作技巧、词汇句式无不留有那个年代、那个阶层、那般年龄必然的历史印记。

## 二、长成期：从政到主政 ( 1923~1931 年 )

1923年1月秋白从苏俄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身体的因素、研究中国实际志向的驱动等等，当然因为结识陈独秀并深得陈的赏识和相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回国后，秋白迅速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因李大钊介绍，秋白曾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一度出任中共上海大学支部书记。在国民党党务工作方面，秋白曾参与该党的改组工作，任鲍罗廷的助手、翻译，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在“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当然秋白更多的精力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回国不久，他就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为大会起草党纲草案并就草案问题向大会报告。1925年，秋白在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参加了大会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案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等组成五人中央局。1927年4月，秋白在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工作，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组成了以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秋白具体分管农委、宣传部工作并出任党报总编辑。1928年4月秋白再度赴前苏联，在那里出席了中共六大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大结束后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后又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成员。1930年8月

秋白回国，11月他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点名批评瞿秋白的调和主义。1931年1月，米夫、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秋白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秋白在从政“主政”到被撤职的八年间，写下了约251万字的文章。除《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所收的14篇（约5.5万字）为文艺性杂著（含文艺理论、小说译作、杂文等）外，其余都为政治理论类著述，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至第七卷。秋白写作重心的转移，与他从事的工作和思维热点是合拍的。1923年他在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还有暇研习所钟爱的文学，但短短数月随着党务工作的日益繁忙，他终于完全丢弃了文学而全身心地投入于政治之中，从此秋白的一切写作动机都服从并服务于党这个中心。在“大革命”的年代里，秋白一方面与旧军阀、国民党作斗争，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另一方面对党内外错误的政治思潮迅即作出抨击评说，发动宣传民众乃至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这个时代固有的动荡激进、惊心动魄和腥风血雨，烙印般地刻记在他六大卷的数百篇文章里。其中像政治论文《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在中共五大散发的约七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等文章，在反击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捍卫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方针，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写作紧密相连的另一项工作是创办、编辑刊物。1923年初夏，秋白受中央委托筹办《新青年》季刊并出任主编，同时他还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与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这些刊物上，秋白先后发表百余篇文章、译作，致力于介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24年3月1日，秋

白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为《民国日报》五人编辑委员会委员之一。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秋白任主编。在该报上，他撰写了发刊词和多篇社论，还分别以“热”“血”“沸”“腾”了五个笔名写了220余篇短文。该报6月16日登出启事称，日报已“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可见《热血日报》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大。可惜出至第24期，该报即被查封。八七会议以后，秋白出任党报总编辑。是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秋白担任编委会主任，亲自题签了刊名并撰写了发刊词。《布》从创刊到1928年4月秋白去莫斯科期间所有的社论及重要文章除一篇为他人所写外，其余均为秋白亲笔。1929年初，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附属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前苏联成立并创办俄文季刊《中国问题》，秋白以“斯特拉霍夫”的俄文化名为七人编辑委员会委员之一。

与编辑工作相关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1927年初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该论文集编成后交商务印书馆，但因“四一二”事变终未出版。根据已排出的部分清样、目录及秋白的自序可知，所选文章为1923年1月～1926年12月在《向导》《新青年》《前锋》《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的主要文章和若干专著汇集而成。该论文集体例按内容分为八辑，其体裁主要有政治专著、政治论文、政治评论和时论、评述、文艺杂著等，总计约170篇文章。

以上我们粗线条地描述了本阶段与写作直接相关的秋白的党内任职和编辑活动。在这八年时间里，他潜心于政治理论写作和党务实用写作（如决议、报告等侧重理论性的公文）以250余万字的庞大容量、所发表刊物的理论地位及在重大会议场合的权威性传播，奠定了秋白早期党内政治理论家、宣传家的地位，其文章也无可非议地成为大革命年代里的力作。总结以上史实，我们可获得如下认识：

第一，旅俄期间秋白的写作已呈多元趋势，但这时期他却舍弃其他而专攻政治理论写作与实用写作，这是历史的选择，是秋白忧患意识、文人气质在特定环境下的必然表现，也是“外部写作动机”与“内部写作动机”有机结合的典范。此阶段秋白文章的多产和高效又与其主编刊物的定时、定期的压力相关。那种自撰的文章一期数篇或数期连发的现象，在秋白编辑的刊物中并不少见，除了个人笔耕的勤奋，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时局和刊物的逼稿所致。

第二，旅俄的经历大大拓展了秋白的思路。眼界高，视野宽，又精通俄文，成为秋白介绍马列、宣传“共产”、“借鉴”国际的得天独厚之处，其撰写政治理论文章自然得心应手，并广受关注。

第三，此间的写作，秋白已大致有总体构想。这一写作习惯在前期两本散文集的序、跋中已有显示，虽该时期文章内容繁杂、量大篇多，时间跨度亦较长，但秋白仍能有条不紊地示人以清晰的脉络。以《瞿秋白论文集 自序》所述和该书目录为例，该书分八辑，每辑冠以总题，轻而易举地将分散发表的各种文章统领于下。尤其是第三至第五辑总题下都有副题，标示“××年之时论”，用序中的话便是“这是我××年的时论之总题”。可见秋白在该阶段的文章是有计划、有总主题的，是一种十分理性、自觉的写作行为。

第四，毋庸讳言，由于应时、应战、应需的写作动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重宣传的浅显和功利，一时的轰动和畅快的现象，因而留下的传世之作不多，精品更少。但这符合政论文体解决现实中思想、政治问题的写作目的，故不必苛求文章的传世功能等非现实性要求。

总之，长成期的秋白文章以庞大的篇幅、数量和犀利的锐气饮誉中国政坛，也预示着其写作成熟期的到来。

### 三、成熟期：“退养”以后 (1931~1935年4月)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秋白被免除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并在上海隐居下来，用他自己在“民二十四年夏汀州狱中拟出的《未成稿目录》<sup>①</sup>中的表述即进入了“退养时期”。退——即从政治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养——的确旧疾肺病时时复发急需调养。就是三年后秋白离沪到瑞金，担任的也只是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sup>②</sup>然而也许是应了祸福辩证的道理，“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sup>③</sup>秋白做梦也不曾料到，在离开文坛近十载后，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这田园将芜、而又情有独钟的文学、文化舞台。从此，秋白的写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秋白的文章并没有因为他在组织上被撤职而离开政治主题，相反在摆脱了“领袖”重负和长期缠身的事务之后，能更理性、冷静地思考一些政治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这使得秋白在延续前一时期强盛的政论文章写作旺势的同时，更使文章平添几分冷静、辩证的理性光泽。这时期秋白的政论文章也并不少，达80多篇34万余字，均收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政论文章不但体裁多样、文体规范而且语体翻

参见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497页注释。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2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1页。

新。像系列“通俗讲话”《种田的乡下人怎么样过活呢》等文章，读者意识强烈，语言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明白，是在通俗化写作理论指导下自觉写作的一个生动范例。另外政治评论《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三民主义的清算》、时事评论《五年前是“到黄埔去”——现在到哪里去》《申报的武断宣传》、政治论文《中国能否抗日》等文章，立论新颖，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说理透彻，篇幅也一改从前偏长的习惯，显得干练精短，不失为政论文章的优秀之作。

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文章写作方面，秋白在这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可谓大丰收时期。《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至第六卷均收有该时期的各类各体文章，字数达 117 万以上。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杂文，二是文学和文字学论文，三是译著（主要是俄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据笔者对《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至第六卷的粗略统计，杂文类约 80 余篇逾 20 万字，文艺论文类近 16 万字，译著最丰富达 85 万余字。由于与茅盾、冯雪峰、鲁迅等的频繁交往，秋白实际参加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面对闹哄哄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大舞台，年轻时写“随感录”的幽默神经又被激活，秋白与鲁迅合作的杂文引起了上海滩的躁动。此时秋白的杂文已脱去少时的单纯与激进，显得老道、幽默和犀利，其风格酷似旁人无可企及的鲁迅，尤其是形象议论、勾勒典型一法，大有与鲁迅异曲同工之神。然而秋白终以自己独特的阅历、志向、气质和厚实的文艺理论基础，使所写杂文与鲁迅相比又有异彩别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精心编选鲁迅杂文，倾力写成《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正确、科学评价鲁迅的第一人。他积极倡导大众化文艺，不但创作了一批仿民间歌谣的通俗词曲，还大力撰写了一批理论文章并积极投身当时的文艺论争，奋力批判反共、反苏、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所谓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同时秋白充分发挥己长，大量翻译介绍马恩列斯和前苏联的

文艺理论论著及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为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文坛输入了清新的空气。秋白与鲁迅、左联战士并肩而战，回击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围剿。

最后要谈的是关于秋白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成果。这是一个遥远的梦。“秋白早在 1920 年就开始了拼音文字的研究”，<sup>①</sup>1929 年他在苏俄就写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小册子。此后秋白一直念念不忘“退养”以后他自觉可以再操旧业，故又开始了具有拓荒意义的语言文字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中“关于语言文字的通信”，收录了秋白与他人讨论、求购有关语言文字参考书籍的书信八封，其中六封集中写于这个阶段。“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辑录了秋白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题论文七篇。从秋白的论述可知，他把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视为普及大众化文化的必要途径，将推广应用普通话和拉丁化拼音文字尊为建设中国文化的千秋伟业。1932 年秋白终于编撰成十万余字的《新中国文案》从字母、声母、韵母、拼音规则、文法规则等九个方面系统地推出了他多年主张的采用拼音方法写出的“新中国的普通话文”。不能不承认，此方案是中国语言学、文字学研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我们对 20 世纪 30 年代秋白在上海及后来到瑞金所写的，约 140 万字的巨著作一粗略分析，可以这么判断：这时期秋白的文章于数量、质量两个方面在政论写作、文学创作、文字学研究三大领域全面获得成功。其各类文章、文体规范自成风格，不乏优秀的代表作，受到文坛、学界和思想界的普遍肯定，同时也标志着秋白的写作进入了成熟期。

第一“退养”以后的秋白重返文学家园，结识了鲁迅并被引为同志。政界失意，文坛得志，纵说是无奈、回归、因祸得福等等都无妨，事实是秋白顺从了历史的安排，他如鱼得水，天才有了用武

之地。

第二，在这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秋白撰有 140 万字的文章，虽总量低于前一时期，但年写作量则高于任何时期，可见他名为“退养”实际并不甘于寂寞，笔耕更勤。他在政论文章写作、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写作，苏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翻译及语言文字学研究诸方面获得全面丰收，无愧为大众文艺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出色的语言文字学者。

第三，这时期秋白的文章，以量和质显示了他写作艺术及文章风格的成熟，标志着秋白已走进了中国现代写作大家的行列。

## 四、绝笔期：在汀州狱中 (1935 年 5~6 月)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多病的秋白被告知留守苏区，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35 年 2 月，秋白才奉命撤离江西，准备绕道福建、广东去香港或上海。2 月 24 日，秋白在福建长汀县水口乡被捕，26 日被囚于上杭县狱。他化名林琪祥，伪造了经历，先后写有《自供》和要求保释的《呈文》。他又给鲁迅、周建人等写信，以求脱身。5 月 9 日，秋白被解至长汀，囚于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在叛徒多方指认后，他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对过去所写的《自供》和《呈文》哈哈一笑，算是我作了一篇小说。之后，秋白的写作进入最后的时期。

5 月 13 日他写下了一份《‘供词’》。据民国 26 年 7 月第 34 期《逸经》刊出的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称：“文长 4000 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

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sup>①</sup> 这段诋毁式的评语足以反证《供词》作者——秋白坚定的政治信念、视死如归的坦然和平静。

5月17日~5月22日，秋白用六天时间完成了总结一生经历、教训、无情解剖自我意识的自传《多余的话》。这篇让秋白死后蒙垢最深的奇文近两万字，分七节：（一）何必说（代序）；（二）历史的误会”；（三）脆弱的二元人物；（四）我和马克思主义；（五）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六）文人”；（七）告别。另有附录《记忆中的日期》，以大事记的方式对他自己从出生到1935年5月9日“解到汀州三十六师师部”等要事作了整理。文章以《诗经·黍离》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为题记，固着了他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与情思，寓寄了他期盼自己同志的理解，袒露了对过去一切的无奈，当然也给后人设下了无尽的读解之谜。然而，不管怎样读《多余的话》只要不是别有用意，任何读者都会感受到这位时时浮现在字里行间的活生生的传主形象：文弱、善思、坦白、真诚、敏感、疲倦、失意、无野心，但有志趣抱负……这些正是除去“领袖”（亦或“匪首”）光环，亦或污垢，而赤裸裸地面对“本我”的大写真。这不正是一个革命者最基本的人性品质和个性存在吗？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取义保节的别一种表现方式吗？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成绩都以轻描淡写的口吻予以贬低。他害怕被人“敬佩”，他写道：自己出生于破落绅士家庭，家中曾没有了米吃还要雇女佣。这种没落绅士意识一直在头脑中与马克思主义斗争，故而造就了二元性格。少时为谋饭碗才学俄文，才入俄文专修馆，才当学生干部，才认识李大钊，才去了俄国，才结识陈独秀，最后才投身政治。秋白坦言：陈独秀下台以后因为无干部才“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这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

① 转引自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483页。

上做窠”，<sup>①</sup>故而大有像一匹羸弱的马拉辘重车上坡的感觉。他承认自己没读过《资本论》和其他马列原著，他对经济学不感兴趣，对军事外行，对创作、对文艺理论……凡他曾涉及过的尽有评价，但都是否定的、贬低的，而惟一肯定的大概只有对自己的译作了。这种否定和贬低，第一是对过去传闻中把自己作为中共领袖而神化作了纠偏，说了一番常人能理解的大实话，力图还自己以普通人的面目；第二是秋白自我要求甚高，自视与心中目标相距甚远，说了一通常人不太能体验的大实话，产生了一些误会。然而这种不遮不掩、无所顾忌的坦言、真言、实言正是这篇奇文的魅力所在。

顺着‘记忆中的日期’的思路，秋白在狱中还拟有一份《未成稿目录》，计划写的文章有两集。其一名为《读者言》，从提纲中的十个篇目内容看，为文艺性随笔。其二名为《痕迹》，分31节，从魂系梦牵的故乡“环溪”起笔，至身陷囹圄、将步离人间的“汀州”止笔。从各节小标题看，均涉及秋白一生各个时期的大事和重要人物，而看其框体架势，定是“秋白自传”无疑，可惜它终成了“未成稿”。

秋白在汀州狱中还给郭沫若一书信，另作有诗词七首：《浣溪沙》《卜算子》《梦回》《狱中题照》《无题》《忆内》和《偶成》。<sup>②</sup>这些诗词也同样真切地表露了秋白在狱中悲凉、低沉、思恋的心情和不屈的意志，像题于狱中小影下的“题照”：“如果有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诗下秋白又附言：“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这另外的“意思”是什么呢？《多余的话》末尾有一句话：“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从这里，从秋白一生的人品性格“注释”里，我们可以读到：躯体可以宰杀，但灵魂却由不得他人，精神可以永存！这又是一种何等的超然

<sup>①</sup>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19页。

参见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